回首百年说甲午

李 侃

今年是甲午战争100周年，明年是抗日战争胜利50周年。这两次战争都关系到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关系到亚洲乃至世界的政治格局，都是中国乃至世界历史上的大事，都值得纪念和反思。

从1894年到1945年的五十年中，发生过日本侵略中国的两次战争，第一次战争的结果，日本胜利，中国失败；第二次战争的结果，中国胜利，日本失败。可见历史变化之快，时势变迁之大。历史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两次中日战争的风云早已消散了，然而作为历史的记录和历史的教训，却将永远地留在人们的记忆之中。人们常说“往事不堪回首”，不过又有许多“往事”又令人不能不“回首”。甲午战争虽然过去了100年，可是每当人们“回首”这件“往事”的时候，又不禁会浮想联翩，感愤交集。甲午战争和《马关条约》一方面给中国带来了奇耻大辱和深重灾难，战争惨败之后的中国所面临的是帝国主义掀起的割地狂潮和瓜分危机，把中国弄得国将不国，如陷深渊。另一方面，它也给近代中国的历史带来重大的转折，促使中华民族加快觉醒。沉重的打击，严酷的现实，也使得清朝的封建统治者不能再照老样子统治下去了；中国的老百姓不能再照老样子生活下去了。为了免遭亡国灭种的厄运，只有弃旧图新，寻求生路。于是，有了戊戌变法，有了义和团运动，有了辛亥革命。所有这些变革和革命，都是为了一个中心目标：“救亡图存”，都标志着中华民族的逐步觉醒。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所遭受的深重灾难，就是以民族的觉醒和奋斗，以战后一百年所取得的社会进步为补偿的。这就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辩证法的发展。

在回顾和讨论甲午战争的时候，被讨论得比较多的问题之一，是如何看待和评论战争当时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关于“和”与“战”两种意见的分歧。这个问题，可谓由来已久，在战后不久，一些封建官僚士大夫和社会人士就各执一词，议论纷纷了。有人批评“主和误国”，有人批评“主战误国”。直到现在，对这个问题的争论似乎也并没有完全了结。当然，现在的讨论和争论，并不是对以往争论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比以往更深更高的层次上展开的。古今中外的战争，对战争的双方来说，都有个“和”与“战”的问题。而“主和”与“主战”，对战争双方来说，也并不是唯一的、绝对的判断是非的标准。问题在于是在什么样的实际情况和主客观条件下“主和”和“主战”。具体说到甲午战争，究竟应该怎样分析和评估当时的“主和”与“主战”？以光绪皇帝和翁同和为代表的“主战派”为什么主战？其原因大致不外乎一是自从鸦片战争到中法战争，历次反侵略战争无一不是以丧师失地、城下结盟、丧权辱国告终。实力远不及英法的“蕞尔”日本，如果任其武力侵犯，清朝再次屈服，那么不但国威国权行将丧尽，而且亲政伊始的光绪皇帝，也将失掉权威，大失民望。二是经过三十年的“洋务新政”，海军已有相当规模和实力，陆军也有不少新式武器装备，如能上下齐心，同仇敌忾，足可抗御侵略，战胜日本，并从而重振国威皇威。用意不可谓不好，理由不可谓无据。然而，他们一则对日本的军事实力和侵华决心估计不足；再则对清朝的海陆军实力估计过高，特别是对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纠纷和

清政府的政治、军事腐败的严重程度估计不足。战争的失败，对他们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也出乎他的预料。然而把战败的责任都加在他们头上，是很不公平的。

以李鸿章、孙毓汶(后来又加上慈禧)为代表的"主和派"之所以"主和"，一是他们一心想着保持"中外和局"不被破坏，同时寄希望于欧美各国的斡旋与调停。二是他们感到在军事上并没有战胜日本的把握，更没有真正抗击日本侵略的决心和准备。在战争打起来以后，正是由一意主和的李鸿章在主持战争的军政全局。侵略者的日本，是经过充分准备、举国动员，倾尽全力，破釜沉舟，孤注一掷，把打胜这场战争视为生死攸关的一战。被侵略的中国，则是意见分歧，和战不定，在日本的炮火烧到脚下，这才临时被迫应战。两相对比，战争的胜负，不问可知。

和平解决中日两国的争端，抽象地说当然没有什么不对。问题在于，在当时的实际情况下，有没有"和平解决"的可能？清廷和李鸿章的"主和"与"求和"，实际上只能是中国单方面的妥协和"求降"。因为日本已经决心把武装侵略朝鲜和中国定为国策，早就准备对中国发动军事进攻，并为此在中国境内作了大量的调查和情报搜集工作。对日本来说，不达到它原定的侵略目的，是决不会罢休的，何况战争的形势发展明显对自己有利，在这种情况下，李鸿章无论怎样三番两次地向日本乞和，结果只能是一厢情愿。其实，此时的"求和"已经无异于"求降"了。

在近代帝国主义侵华战争史上，除了抗日战争之外，从来没有一次是以外国侵略者与清朝统治者互相让步，以"和平解决"为结局的。战争是敌对双方综合实力的较量，只有能战才能言和，不能战而言和，只能是战败求和。这种所谓"和"，其实就是投降。"和"字在近代中外关系史上已经成了"降"的代用词，不是连《辛丑条约》也称为"和约"么！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也是最有名的"主和"论者，"主和"的结果，是投入日本侵略者的怀抱，作了日本卵翼下傀儡政权的首领，当了最大的汉奸卖国贼。

有人会说"主和派"固然导致了战争的失败，然而"主战派"不是同样也没有挽救战争失败的命运吗？从战争的结局看当然是这样。不过从当时中日两国的国力和条件来看，如果清朝统治者齐心协力、坚决抵抗、指挥得当，也未必非败不可。因为：在军事力量上，虽然在海军舰只的装备和速度上中国略差于日本，但是并不是相差悬殊，陆军人数远远超过日本，装备也不是相差太远，而海陆军中都有一些爱国的将领和爱国官兵。在战争中表现了英勇奋战，为国捐躯的英雄气概。日本远离本土作战，在军需的供给和运输方面的困难，要比中国大得多，日本的财力物力，到战争后期已经消耗殆尽，战争持久下去，很难坚持。中国之败，败在统治阶级的腐败，败在战争全局指挥者的畏敌退缩和苟安谋和。甲午战争时期的"主和派"，不论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没有任何积极意义可言。

在纪念和讨论甲午战争100周年之际，我们至少可以从这次战争中取得两点历史的教训和启示。一、在抗日战争以前的历次反侵略战争都失败了，为什么失败，原因不止一端，但是有一个共同的也是重要的原因，就是清朝统治者从来不能也不敢动员和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抵抗侵略。外国侵略者给中国老百姓造成的灾难最深最重，人民群众对侵略者最痛恨、反抗也最强烈最坚决，然而这种抵抗多是局部的和自发的，不但得不到清政府的支持和帮助，而且往往遭到清政府的阻止和破坏，甚至镇压。这样的事实，可谓不胜枚举。历史的经验说明，弱国抵抗强国的武装侵略，特别是在外国侵略者侵入本国领土的时候，只有人民起来，进行武装抵抗，而且这种抵抗需要有坚强的领导，并且得到政府的支持，才能有效地抗击和打击

敌人。抗日战争之所以最终胜利，一个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全民抗战，特别是在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面对日本侵略强盗极度的凶残与暴虐，解放区的人民还是英勇地坚持了敌后游击战争，甚至在华北平原地区那样艰苦的环境之下，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和智慧，创造出地道战、地雷战等等有效的办法和以神出鬼没的战术，保护人民，打击敌人。谱写了抗日战争中可歌可泣的壮烈诗篇，创造了人民战争的奇迹。反观甲午战争，清朝统治者根本无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也不关心人民的苦难，海陆军相继溃败之后，只有赧颜投降。断送祖国的领土和主权。统治者既然不顾人民的死活，人民群众也就对统治者失去信任和希望。甲午以后，清朝统治者一步一步沦为"洋人的朝廷"，人民群众为了生存和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也就只好奋起斗争，推翻这个"洋人的朝廷"。二，中国靠什么求富强？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兴起的洋务运动，照洋务派首领们的说法是"求强求富"。这"强"和"富"两个字，确实是中国最需要的东西。近代中国之所以不断挨打受辱，恰恰就是因为弱和穷，所缺少的恰恰就是富和强。然而，如果没有国家的独立，在外国资本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宰割之下，又怎能富强起来？李鸿章等洋务派首领们苦心经营了三十多年的"洋务"，确实也做了不少事情，开始有了一些近代工业，造了一些新式武器，近代海军也颇具规模，新式学堂也建立了几个，留学生也向外国派遣了不少。从表面上看，洋务事业确有成效，洋务首领们也沾沾自喜，以为有了这些"资本"和"家当"，中国就可以再不挨打，"中外和好"的局面就可以长久保持了。可是甲午一战，一败涂地。不但北洋海军化为灰烬，"洋务新政"也宣告破产。有人说洋务运动是一次成功的改革，甲午战争失败并未宣告洋务运动破产，理由是洋务运动时期所建立的近代工业和其他事业并没有因为甲午战争失败而消失。如果这个理由成立。那么中国连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也不能说是失败，因为戊戌变法时的许多主张后来都被清朝政府作为"新政"而实施了；辛亥革命诞生的"中华民国"也被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沿用了三十多年。然而谁也不能否认这次变法和革命最后还是失败了。衡量一次变革、一次革命和一次政治运动的成功和失败，是看它是否达到了或基本达到原定的目的，而不是看它的历史作用。说洋务运动破产和失败，就是因为它并没有达到"求强求富"的目的，它不但没能使中国富强，而且经过甲午一战，中国变得更穷更弱，落得个面临瓜分豆剖、国将不国的地步。连李鸿章们也不再标榜洋务和以通晓洋务自诩了。洋务运动的失败，基本原因就在于当时的中国是帝国主义的半殖民地，是自己的命运操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手里的国家。没有国家的独立，就不可能有国家的富强和近代化。这已经是被历史证明的事实。如果洋务运动能够救中国并使中国近代化，那就不会有戊戌变法；如果戊戌变法能够救中国并使中国近代化，那就不会有辛亥革命；如果辛亥革命能够救中国并使中国近代化，那就不会有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当然，这样说并不是完全否定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各自不同的历史地位和历史作用，而是说中国近代历史的客观进程和发展的必然趋势。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这并不是凭空臆想出来的口号，而是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和历史发展所得出的结论。